

中国古代史

中 册

(试用稿)

甘肃师范大学政史系中国史组编

一九七七年四月

目 录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和南方经济的发展

(公元185——589年)

- 第一节 三国分立和三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1)
- 第二节 西晋时期世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和世族地主政治特权的确立…………… (17)
- 第三节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割据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28)
- 第四节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 (37)
- 第五节 北朝时期各族人民的大融合…………… (47)
-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 (62)

第六章 隋唐五代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的强化、各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农民起义的巨大作用

(公元581——960年)

- 第一节 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的建立和措施…………… (78)
- 第二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及其伟大的历史作用…………… (93)
- 第三节 唐代中叶以前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经济的繁荣…………… (102)

第四节	唐王朝为巩固统治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在均田制瓦解过程中府兵制的瓦解·····	(117)
第五节	安史之乱和藩镇的割据·····	(127)
第六节	中唐以后两税法的创设、封建经济领域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剥削率的增长·····	(139)
第七节	永贞革新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151)
第八节	唐和边塞各族的关系·····	(163)
第九节	唐代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关系·····	(180)
第十节	唐代的文化·····	(193)
第十一节	唐末农民大起义和五代十国·····	(212)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和南方经济的发展

(公元185——589年)

第一节 三国分立和三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三国分立局面的形成

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被镇压后，腐朽黑暗的东汉统治者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变本加厉，有增无已，东汉政府为修筑宫室而增加了租税和工料的征收，为扩大聚敛而扩大了卖官鬻爵的范围。与此同时，官吏向人民百般搜刮，地主继续兼并土地，甚至以皇帝之尊，富有天下的汉灵帝，也“还河间，买田宅”①，参加了地主兼并土地的行列。

但是，“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黄巾起义的被镇压并没有把革命人民吓倒，更加腐朽黑暗的东汉统治只能激起人民进行更加顽强的反抗，农民起义，前仆后继，革命的烽火在全国各地继续燃烧。公元185年，以张牛角、褚飞燕、于氏根、张白骑、雷公、于毒、眭固等为首的农民军，起义于冀、豫边区及太行山

一带，“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统称黑山军，众至百万，坚持斗争长达二十年之久；以北宫伯玉为首的羌、胡、汉各族人民起义，发展于今甘肃各地，并一度扩大到关中。公元186年有江夏兵变和武陵蛮的起义。公元187年，有荥阳、长沙、桂阳、零陵等地的农民起义。公元188年，在今山西地区，以郭太为首的农民军起义于白波谷，众十余万，活动于太原、河东诸郡，同时还有屠各胡人民起义，杀西河郡太守及并州刺史，与白波军互为声援；在今河南地区，以汝南葛陂为中心的黄巾军，重整旗鼓，攻占了附近的许多郡县；在今四川方面，马相领导的起义军杀死益州刺史，进攻蜀郡、犍为郡，并杀死巴郡太守，起义军扩大到十余万人；在今山东地区，青州、徐州黄巾复起，男女百余万口，攻城略郡，使统治者望风披靡。至此，全国各地农民的武装斗争，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

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进一步削弱了东汉的统治，也瓦解了东汉政权。面临着各地起义的继续爆发与扩大，东汉政府一面加强禁卫军，置西园八校尉，卫戍京师；一面加强地方政府权力，改州刺史为州牧，使其兼领军民，以便权时应变镇压起义。不仅如此，由于在农民起义打击下，东汉政府已经充分暴露了无力维持其统治的危机，各地拥有实力的世家豪族地主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也都纷纷聚结宗族宾客，扩大家兵部曲，与农民起义为敌，并成为镇压农民起义最主要的力量。

镇压农民起义，为州郡权力的扩大和地主武装力量的发展，为军阀割据混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就使从东

汉以来，日益强化的封建依附关系所导致的地主势力的发展及其必然走向分裂割据的形势，进一步明朗起来了。也就是说，汉末出现的分裂割据，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控制了大量依附农民，从而拥有独立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世家大族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表明，东汉末年的每一个割据势力，也都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世家大族和豪强地主势力的集合体，如袁绍就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并拥有武装部曲的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曹操不仅有自己的宗族部曲，而且是夏侯氏、李典、李乾、许褚、任峻等豪族地主武装集团的代表人物；董卓的部将多出身于陇西豪强地主和羌族豪酋；孙吴集团则由江北豪族地主和江东豪族地主所组成；刘备得到了荆州地主集团的支持而占有益州；公孙瓒凭借着“家世二千石”而割据幽州。

在各地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四分五裂的东汉统治摇摇欲坠，已经进入了日暮途穷的绝境。东汉政府也陷于瘫痪状态而失掉了对于地方军政长官和地主武装的控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因镇压农民起义而壮大起来的州牧郡守和世家豪族地主武装集团，为了掠夺更大的地区，为了攘夺最高统治权，攫取镇压农民的领导权，终于展开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军阀混战。永汉元年（公元189年）董卓带兵进京，废掉少帝，另立刘协（汉献帝），独揽东汉军政大权。公元190年，关东州牧郡守和地主武装集团各树一帜，以袁绍为盟主，联兵声讨董卓，于是“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②”。军阀割据混战的局

面，从此开始了。

在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各路军声讨下，董卓唯恐白波农民起义军断其西归之路，遂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企图以关中为根据地，割据西北。不久，董卓为其部将吕布刺杀，关中成为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互相角逐的战场。与此同时，关东各路以讨伐董卓为名的联军也分崩离析，展开了争夺地盘的互相厮杀。经过几年的混战，一些势力被消灭，袁绍占据了冀州和青、并二州的大部分，公孙瓒占据了幽州，曹操占据了兖、豫二州，陶谦占有徐州，袁术占有淮南，刘表据荆州，孙策据江东，刘焉据益州，公孙度据辽东，西北地区则是韩遂与马腾的势力。

封建割据势力对农民的镇压和他们之间的混战，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使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关东诸将声讨董卓时，兵集荥阳、河内一带，抢劫钞略“民人死者且半”。董卓部将在陈留、颍川到处杀人，造成数百里中无烟火的荒凉景象，董卓西迁时，烧掠一空，徙人户西行。“洛阳二百里内无复孑遗”。李傕、郭汜战乱后，长安城中尽空，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关东诸将声讨董卓时，在荥阳、河内一带纵兵抄略，民人死者且半。曹操攻陶谦于徐州，坑杀男女数万口，墟邑无复行人。袁术以抄掠为资，江淮空尽。金城因韩遂马超之乱，人民流丧，余户不满五百。仲长统记述当时的情况说：“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王粲的七哀诗写道：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正是当时社会萧条悲惨局面的写照。长期以来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就这样变为满目凄凉的荒原。

针对着军阀割据，各地的革命人民采取了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时机，向各个封建割据势力，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农民以流亡的方式来摆脱封建割据势力，削弱直接统治他们的军阀，如青州、幽州人民流徙关东，关中人民流移荆州，南阳人民流入益州，徐、豫人民流往江南。农民军还利用统治阶级互相战争的时机，来削弱他们的势力，如袁绍攻韩馥取冀州时，冀州的黑山军对韩馥多方袭击，因而促使韩馥败亡。袁绍占领冀州后进攻公孙瓒时，黑山军又乘机袭击袁绍，并且经常威胁着袁绍在冀州的统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黄河南北的一些军阀割据势力被消灭，腾下一个代表世家大族利益进行割据的袁绍，一个维护中央集权要求统一的曹操，最后双方进行决定胜负的官渡之战时，黑山农民军在袁绍后方展开了连续的斗争，给予袁绍以严重的威胁，这对于曹操之所以能够击败袁绍统一北方是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的。

在农民军的打击下，在各个割据势力的并吞中，一些势力被消灭了，曹操的势力逐渐壮大起来。曹操在参加关东军声讨董卓后被袁绍表为东郡太守，公元192年青州黄巾军攻入兖州，杀死兖州刺史刘岱，曹操被兖州郡县官吏及地方豪强推为兖州牧，战败了农民军并从收编的黄巾军中选拨精锐扩充队伍，进一步占有兖、豫二州，这时他已经成为仅次于袁绍的第二大实力集团了。曹操采纳毛玠的建议，实行“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所谓“奉天子以令不臣”，就是利用东汉皇帝这个名义维护中央集权实行全国统一，来对付割据势力；所谓“修耕植蓄军资”，就是发展生产进行屯田，来为实现中央集

权和统一而积蓄军需，准备物质条件。公元196年，曹操把从长安逃回洛阳的汉献帝迎接过来，定都许昌，同时在许昌附近开始屯田积谷。曹操实行统一路线是袁绍推行分裂割据的障碍，袁绍进行割据同曹操当然誓不两立，袁曹两大势力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官渡之战。

公元200年，占有冀、幽、青、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大割据势力的袁绍，调集了步兵十万，骑兵一万，向南推进，企图以压倒的优势，战败曹操，而曹操用以抵抗袁绍的军队，不过两万余人。鉴于敌强己弱，曹操一方面充分利用袁绍集团的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一方面在战略战术上采取声东击西，避开主力，出其不意地用奇兵解白马之围。然后，先让一步，选择了有利于己的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北），高垒固守，拖着袁军，待机而动，等到袁军粮草缺乏，曹操遂以精兵五千偷袭离袁营四十里的粮草屯积地鸟巢，放火烧粮，引起袁军荒乱。袁绍认为这时官渡空虚，以主力攻打官渡，曹操乘势出击歼灭袁军七万余人，袁绍逃回河北。官渡之战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范例，这一战役的胜利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由于官渡之战代表中央集权实行统一的曹操战败了最大割据势力的袁绍，两年以后曹操又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劳力，并进而征服了同袁尚勾结的乌桓贵族统治者，这就使黄河下游的北方重新恢复了统一的局面。

公元208年割据于荆州的刘表病死，曹操率军南下，刘表子刘琮迎降，曹操顺利地占有了江汉地区，并准备顺流东下消灭长江下游的孙权。这时依附于刘表寄托在荆州

的刘备带领自己的军队向南撤退，在诸葛亮的推动下同孙权结成联盟，共御曹军。赤壁（今湖北嘉鱼县境内）之战，诸葛亮及周瑜利用曹操骄傲轻敌的错误和曹军远来疲弊、北军不习水战及新得荆州降军并非心服等弱点，采取火攻战术，以七、八万之众大破曹军二十余万人，这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又一范例。

赤壁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孙权保有长江下游，刘备暂时立足于荆州，不久又占有益州。他们分别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扫除了分裂割据势力，改变了汉末大分裂的状态，为全国大统一创造条件。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代汉称帝，改国号曰魏，都洛阳。次年刘备在益州称帝，国号曰汉，都成都，史称蜀汉。公元229年孙权在江东称帝，国号吴，都建业（南京），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所说的三国。三国分立时期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是由分裂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过渡时期。

二、曹魏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又说：“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经济制度要靠政治来给它开辟道路，靠政治来保护它，发展它。曹魏的一切政治设施，不言而喻，也是为当时的封建经济制度服务的。

经过黄巾大起义和接踵而来的各地农民继续起义，社会大动盪，封建秩序被打乱，封建土地所有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的地主

被镇压，封建统治的基础因之而削弱，大量的农民参加了起义，或逃亡山林，因而摆脱了封建的统治与剥削。与此同时，镇压起义和军阀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形成了“田无常主，民无常居”③，人民死丧流亡，土地荒芜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广大农民无法生活，甚至连拥有武装的军队也抢不到粮食，而不得不用桑椹、枣子及蒲螺来充饥。因此，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除了对起义农民实行镇压之外，还必须把一般农民严格控制起来，束缚于土地之上，进行生产，从而为统治者提供租役，以解决刻不容缓的军需民食问题。

曹魏的创始人是曹操，他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之一，是当时地主阶级中主张搞一些革新的人物，他崇尚刑名“揽申商之法术”④。为了实行中央集权，维护全国统一，他积极推行法治，宣称“吾在军中持法是也”。他立法很严“重豪强兼并之法”，禁止豪强迫使贫弱代出租赋，严厉打击豪强，制止豪强专横及其不法行为。他打破了士族包办选举，垄断官吏的察举制度，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办法。他在统一北方的同时，还实行了屯田制度，使残破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

早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就在许昌附近开始实行屯田，接着又把屯田区推广到许多郡县。为了管理各屯田区，曹魏设有相当于郡守职位的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相当于县令长的典农都尉，以及下级的各种典农官。屯田区不属于郡县，典农官由军官充任，对于屯田上的生产劳动者具有军事管理的性质。

屯田上的生产者——屯田客，一部分是由被击破的农

民军编组起来的，一部分是由曹魏边区或进军而未能占领的地区强迫迁来的，更多的是以招募之名，行强迫之实，而被输送来的流民，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受骗或其他原因而前来屯田的。⑤他们一经编制在屯田上，就受到了严格控制，同封建国家发生了人身隶属关系，成为国家的佃客，他们如果使用官牛生产，须按四六分缴纳实物地租，不用官牛的按对半分缴纳地租。如果说初期的田客不服徭不役，到后来，各项徭役负担也逐渐加在他们身上来了。

曹魏屯田制实际是当时世族地主与依附农民关系的投影，国家与屯田客的关系同世族地主与徒附、部曲的关系并无区别，只不过一个是依附于国家，一个是依附私家而已。但是，就其作用来说，大量农民之依附于私家地主则扩大了地主势力，为分裂割据提供了条件，而实行屯田制，却强化了中央集权，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民屯之外，在魏、吴边区还有且佃且守的军士屯田。军屯的规模也很大，淮南三万人，淮北两万人。军屯实际是政府以军士为部曲使其打仗，又以军士为佃客从事生产，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部曲的集合体，这同私家地主之与家兵部曲并无二致。

为了保证兵源，曹魏政府对军士的控制十分严格，军士别立户籍，称为士家，世代当兵，战时出征，平时也要在士家集中居住的地区进行屯田，并且规定士家婚配限于士家范围之内，军士逃亡，妻子被处死刑或没为官奴婢。隶属于政府的士家和屯田区的屯田客，如同依附于私家地主的部曲和佃客出于一辙，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封建依附关系进一步强化，但是它却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不利于地主占

有大量劳动人口。由于曹魏政府拥有为数众多具有严格隶属关系的士家和屯田客，作为榨取粮谷和征集兵员的主要对象，也就为曹魏统一北方和实行中央集权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除了依附于世家豪强地主的佃客、部曲和隶属于政府的屯田客、士家之外，还存在着自耕农民，也是政府剥削的对象。曹魏对他们制定了按土地每亩收租谷四升和按户纳捐二匹，绵二斤的户调，此外，自耕农民还须负担各项并无限制的徭役。因此，他们的情况并不比国家屯田客和私家佃客好。

由于生产的恢复，在生产恢复的过程中世族地主的势力也有了进一步地发展，随着世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为了满足世族地主的政治利益，为了取得世族地主的大力支持，曹操死后，曹丕在准备以魏代汉登上皇帝宝座之前，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度(也称为九品官人法)，由政府选择官员中的世家名士兼任本州郡的中正，然后由中正将本州郡的人材，按三等九品加以区分评定，以供政府选用。由于担任中正的既是朝廷大官，又是地方世族，他们品定人物，自然有利于世族地主操纵士途。九品中正制的创始，为世族地主建立政治特权，巩固经济利益，造成社会地位，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对世族地主势力的巩固与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制度发展到西晋，就成为世族地主把持政治的有力工具。

曹魏时期世族地主势力的发展，终于使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世族地主同以曹氏皇室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明争暗斗。从司马懿发动政变掌握魏国大权，经

过多次的军事较量，司马氏压平了他的反对者，最后，以司马炎代魏，改建晋朝而告终。

曹魏时期，农民起义虽然处在低潮，但在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下，人民的反抗斗争始终没有间断。刘廙给曹操上书提出“皆以户口率其垦田之多少，及盗贼发兴，民之亡叛”考核地方官吏，说明曹魏统治下的农民起义或逃亡是普遍存在于各地的严重问题，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当曹操用兵关中时，有河间人民田银、苏伯领导的起义。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令淮南人民迁至淮北时，江淮人民十余万逃亡江南。建安十八年（215年）屯田客在吕并领导下起义，占领陈仓。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操进攻刘备时，人民苦于徭役，南阳守将侯音在民怨沸腾下举兵起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陆浑人因反抗征调徭役，由孙狼领导，发动起义，同时还有许昌人民起义，响应关习进军北上。黄初六年（225年）曹丕东征孙权时，利城郡兵蔡方等起义，并有许多农民参加，攻杀郡太守徐质。此外还有很多聚保山泽的农民武装如郑甘、王照等为首的所谓“山贼”，这些起义，虽然由于力量悬殊，都被镇压下去，但是农民却始终坚持着继续不断地阶级斗争。

经过黄巾大起义及其以后的长期连绵不绝的阶级斗争，一部分农民在“田业无主”的情况下获得了土地，积极从事生产，一部分农民被迫编制于屯田上而与土地相结合。与此同时，曹魏政权为了适应民屯军屯不断推广的需要，役使广大劳动人民兴修水利，不但过去扬州地区的芍陂、茹陂等都得到了重新修复，而且豫州地区利用汝水造成新陂，通运渠三百余里而成贾侯渠，沛郡修建了郑陂，

河内郡引沁水灌溉，以至于关中和凉州地区也都进行了不同规模的水利设施。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首先获得了恢复。与农业紧密相连的手工业以及商品交换也随之而恢复，被董卓焚烧一空的洛阳又繁荣起来，成为北方的最大都市，河西走廊又成为西域各国和内地通商的要道，不少西域商人往返于洛阳。曾经宣布废止的五铢钱，到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年)也正式恢复使用了。

三、孙吴统治下江南世家大族的兴起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江南豪族孙坚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孙坚死，长子孙策率领部曲先后消灭了长江下游的割据势力，统一江南。孙策死，弟孙权又取得了荆州和岭南，使孙吴统治区扩大到我国东南半壁河山，略次于北方的曹魏。

孙吴的统治，除依靠江北南下的地主如鲁肃、周瑜等的支持以外，主要建立在以江南顾、陆、朱、张等为首的世家大族的基础上。在孙吴统治下，江南北的大族，不仅有众多的宗族，而且拥有大量被称为“客”的依附农民。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孙吴政权对世家大族给以赐田、复客、免赋、免役等等特权，周瑜死后，孙权下令“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①。潘璋死后，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吕蒙死后赐冢户三百家，并允许吕氏的五十顷土地不纳租税。诸如此类给客、赐复、赐田、免租的事例，屡见不鲜，显然，世族地主发展中的封建依附

关系已得到了孙吴政权的确认。

如同佃客和土地由子孙世代继承一样，江南世族地主还把自己控制的宗族和客编成自己的私有军队，由子孙继承统领，从而形成一种世袭领兵制。当时魏国邓艾曾经指出“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⑧。可见世家大族，都拥有独立而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如此，世家大族的子弟还可以世袭爵位，获得官职，因而陆氏一家先后就有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至于四姓子弟担任郡县守令等地方官吏的那就更多了，三国志吴志朱治传说：“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这充分地说明了孙吴政权是世族地主垄断的政权，南方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已在形成之中。

在孙吴统治区较偏僻的山区内，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土著居民，当时被称为山越。为了掠夺劳动人手和补充兵源，从孙吴建国后即不断对山越用兵，迫使山越出山，每次被迫迁徙出来的山越人，除补充军队之外，一部分被赐给世家地主和功臣作部曲或佃客，大部分则用来屯田。孙吴同曹魏一样，实行了屯田的耕战政策，对我国东南地区进行了开发。吴国的屯田也有军屯和民屯，也有采用军事编制的屯田管理机构，仅在毗陵（江苏武进）的民屯就有男女各数万口。这些隶属于国家的屯田客，也往往被分赐给功臣地主，如吕蒙受赐有寻阳屯田客六百户。

山越人的大量出山和北方劳动人民在军阀混战时期的大量南移，为江南经济的发展补充了劳动力，提供了进步的技术条件，从而南方的耕地面积扩大了，产量增加了。左思《吴都赋》说“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

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反映出当时农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吴国的造船业非常发达，因而海上交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孙权派使臣从海上同辽东的公孙渊来往。会稽郡沿海一带人民经常同夷洲、亶洲等海岛进行贸易往来，由于人民之间的往来频繁，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国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带兵到夷洲，夷洲即台湾，可见台湾自古以来就同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文化联系，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吴国同海外诸国的交通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吴国曾派康泰、朱应出使南海诸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⑨。吴国还派刘咸随同前来贸易的大秦（罗马帝国）商人到罗马帝国建立关系，但因刘咸病死途中，没有到达。

在南方经济发展中，江南世家大族借助于政治特权，控制劳动人民，掠夺土地，进一步扩大地主经济势力，他们“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⑩。而受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却“老幼饥寒，家户菜色”⑪。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也必然爆发为一连串的农民起义和反抗斗争，建安十八年（213年）有豫章（江西南昌）人彭材、李玉、王海等为首的起义，延康元年（220年）桂阳郡滇阳（广东英德）有以王金为首的起义。嘉禾三年（243年），卢陵（江西吕水）有李恒，东冶（福建闽侯）有隋春，南海有罗厉等为首的起义。此外还有鄱阳以彭旦为首的起义，交趾（越南北部）以吕兴为首的起义，永康（今浙江永康）以施旦为首的起义，广州以士兵郭马为首的起